



教育的性別視角

課堂與教學實證研究

蔡寶瓊、陳潔華 編著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教育的性別視角

課堂與教學實證研究

蔡寶瓊、陳潔華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12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2012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ender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into Schooling Process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209-5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言

從千禧年左右開始，香港繼英語社會如英國、美國和澳洲等之後，出現對性別差異的關注，而其中又涉及對女性學業成就冒起、男性失利等的恐慌。對我們性別研究者來說，大眾關注性別議題本來是好事，可惜，坊間出現的「男女大不同」和「女生超越男生」等說法卻是令人擔憂的。首先，這些多數是沒有實證基礎的、「想當然」的意見，但因為它們往往與社會主流的性別定見吻合，所以就會進一步鞏固既有的性別二元觀，使人誤以為兩性在性向、能力等方面處於兩極的位置，而且認定兩者之間的差距是天生的、是必然如此的。這種流行的二元觀和「天生論」，一方面扭曲現實——因為事實上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不能簡單地歸因於性別，而且更重要的，是性別二元觀和天生論大大窒礙個人的發展，因為無論性格、志趣，以至職業、社會位置等，如果被一個簡單的二元框架規範的話，個人往往要作出很大的犧牲，甚至要承受很大的痛苦。

本書兩位編者多年來致力於性別研究，同時亦擔負起學院的師訓課程設計和教學。目睹社會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增加，而學界在這方面卻反應不足，其中影響下一代尤其深遠的師訓課程，至今還沒有引入性別向度，於是在2009年12月19日，召集了一個小型的「性別與教育」寫作研討會，邀請香港為數不多、對性別和教育課題曾作過實證研究的朋友參加，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最終目的，是出版一部有關性別與教育的書。兩年多以來，大家討論、閱稿和修改，來回往復，結果竟成就了兩個文集——本書和另一本名為《性別顯微鏡——教育與個人成長》的文集。兩本書的特色，在於文章都基於實證研究，而且具有清晰的理論框架，讓讀者能從一個非一般的、非想當然的角度去了解性別如何形塑教育過程和內容，又如何反過來在教育過程中被形塑和轉化。性別是如此切身，但我們卻不習慣（或甚至抗拒）客觀地剖析它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因此，本書提供一個嶄新的性別視角，希望讀者能以此來從新檢視教育這個重要的社會生活範疇。

本書概略

全書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課堂與教學，共有四篇文章。教科書對學生性別角色的培育影響深遠，李鳳琼的歷史研究，嘗試剖析過去20年間，香港中學英文教科書在性別描述和中性語言運用方面有否出現改變。隨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政府提倡男女平等的努力，作者發現英語課本出現了某些改變，例如在現今課本中，女性出現的頻率較高、中性代名詞和女性被稱呼為Ms的情況也有增加。然而現今的教科書仍有性別定型的情況，例如女性仍多以家庭身份（而非個人身份）出現、較常被形容為弱者，或地位仍然低於男性。但作者也提醒我們，即使課文本身有性別偏差，老師如何處理課文內容對學生的影響可能更為重大。

家政課程的演變也值得注視。黎楊惠玲指出家政課程向來被視為「女性科目」，旨在預備女生成為未來賢妻良母。但近年家政課程已革新，而教育局亦於2001年向學校發出指引，要求男女校和女校的學生都有機會修讀家政；這些改變令家政科可以成為提升學生性別意識的平台。然而，作者亦指出要成功透過這學科推行性別平等教育，除了老師的性別意識和教學策略要改變外，如何令這學科不被邊緣化也很重要。

「兩性的學習差異」一向是教育工作者關心的議題，本書兩位作者羅浩源和呂惠珊分別以數學和英文學習為例嘗試拆解有關的迷思。羅浩源指出，綜合不同的研究和討論，學者並未能通過科學實證，來確立兩性的數學能力與先天或生理因素有關。隨着女生數學成績的顯著進步，近年較多學者關心為何女生「有好成績但仍有壞的感覺」？為何她們一早就放棄進修數學的機會？為何女生的課堂參與度仍然較低，而較多女生仍會選擇用沉默或迴避等方法來隱藏自己的思想或令自己在群體的討論中消音？根據羅浩源的分析，女生這些表現，並不是源於兩性的學習能力差異，而是涉及社會文化如何將數學這學科建構成抽象、客觀的真理，從而鼓勵教師與學生都傾向以抽離的運算技巧和語言進行學習。我們只把注意力放在女生和部分男生的能力和資質上，從來沒

有注意到數學學科這種抽象、單向和單一的課堂傳意模式，會令不少女生(和部分男生)消音，無形中剝奪了她們的學習機會，也使數學學科內容和教法出現偏差。

呂惠珊也以第一組別(Band One)學生的學習體驗為基礎，分析他們如何賦予數學和英文科不同的價值和意義，從而付出不同程度的努力。縱使英文成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和勞動市場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學生卻只重視其功利價值，並認為它的學術地位較數學科低。呂惠珊透過與學生訪談，發現這種偏見源自前者的課程設計較着重情感表達、主題學習、文化滲透，而後者則有極其規範化的課程結構和「一板一眼」的學習程序。有趣的是，這種學生心目中的「知識階梯」將數學陽剛化為理性、客觀的科學，而將英文陰柔化為主觀、非理性的知識。與此同時，學生亦會將數學和英文科的好成績，分別歸因為「有智能」和「非智能」的表現，並視數學「叻」的同學為「真正學習者」。正因為英文科被賦予「次等」、「陰柔」和「非智能的學習」等意義，學生一般都不願意付出太多，而男生的投入感則更低。因此，呂惠珊指出，要改善英文科的學習，並不是增加趣味、男性教師或男生導向的教學法，而是重塑學科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擴闊我們對知識的想像。

本書第二部分關乎教育工作者的性別意識，也有四篇文章。如導讀所述，香港性別與教育討論大多是有關男女學習差異的量化研究。雖然有關學生性別身份的研究已開始出現，但有關教育工作者自身的性別身份、性別意識、教學策略，如何形塑和推動學校性別文化和影響學生的討論仍然不多。第二部分輯錄的數篇文章，正好填補這方面的欠缺。

龍精亮、陸方鈺儀和王秉豪的華人男教師的研究補充了本土有關男教師性別研究的嚴重不足。龍、陸和王的研究顯示，香港男教師似乎仍有很強的傳統中國文化下的男性特質，他們仍會強調「養妻活兒」、「照顧家庭」、「追求卓越」、「作領導者」及「堅強」等的家庭角色和特性。男教師性別身份的建立，除了受傳統中國對男性要求所影響外，也受武俠小說、自身家庭經驗，尤其

是父親的正面和負面例子影響。而成長時，學校文化、老師的期望和榜樣也是重要影響之一。

陳潔華的文章則透過審視男校長的詮釋框架和敘事策略，突顯他們潛藏的性別意識，並揭示他們如何不經意地忽略、強化、或合理化性別不平等。例如當男校長評論自己的職位晉升經歷時，大多會否定性別的重要性、強調個人努力和對工作的承擔。當談論男女教師的工作能力時，則會強調男女老師的不同，甚至女老師「細緻」的優點。當討論男女校長的領導風格，又會指出各有長短。然而，當我們細心剖析那些看似沒有性別、或「男女有別」的論述時，不難發現男校長似乎以為只有女性才有性別、或否認性別這因素對工作有任何影響。再者，所謂「男女有別」，往往強化了性別定型、男強女弱的看法。校長既是招聘員工、分配工作，以及制定和執行學校政策的重要決策者，他們的性別觀念對老師和學生影響深遠，我們必須予以注視。

鄭佩群的文章嘗試分析「模範教師」論述的限制和束縛，揭示老師的性別意識如何影響學生的性別身份建構。當教授性教育的教師強調「身教」較言教重要的同時，他們亦要對自身的道德思想、言行舉止和身體不斷進行規訓，但過程中卻出現不少矛盾和抉擇。例如哪個範疇的「私生活」可以成為教材；怎樣的身體呈現才算專業、有教育意義而又符合性別期望；怎樣的男（教師）及女（學生）的身體界線和觸碰才是安全又不失關愛等等。所以，受訪的教師亦往往會透過「身教」，不經意地向學生傳遞了異性戀中心主義和性別刻板印象等訊息。

但是有性別意識的老師的情況也不一定容易。作為性別研究和酷兒認同學者的金曄路和鄧芝珊，以她們在香港、中國和台灣的教學經驗，分享她們在政治、教學和身體等方面的定位、反思和困難。縱然女性主義教育者強調研究和體現性知識的連結、教學與個人實踐的互動，但是金和鄧的經驗卻顯示教學策略的選用，例如會否自我界定為某種政治認同或身份，或會否分享「個人」經驗，除了要考慮不同文化對某些身份的解讀、「現身」策略的目的和對學生影響，也要平衡(酷兒)教師作為隱私個體的整全性和對其學術事業的發展。

她們的分析清楚指出，要實踐「逾越教育學」，我們需要打破院校中根深柢固的父權意識和異性戀中心主義，挑戰教育產業化對非主流學科——性別研究和酷兒學者——的邊緣化，並要正視現有的學科體制有否窒礙有志修讀性與性別研究的學生。

第三部分則是較宏觀的討論，有三篇文章，內容涉及師訓課程、學院政策和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社會脈絡與前景。縱然教育工作者的性別意識會直接影響學生的性別身份和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效益，但是現時香港的師訓機構並沒有重視這方面的培訓。姚偉梅、黎楊惠玲、陳潔華和林藹陽的文章指出，雖然香港教育學院是主要的師訓機構，但它的培訓課程，只有極少數單元——約十個百分比——是有助提升性別意識的。更甚者，這些單元只是選修性質。如此不重視性別教育的師訓課程，只會深化教育工作者的性別成見。

要推動性別平等教育，除了教育工作者要具備性別意識外，如何將校園締造成為一個安全、正面及友善的工作或學習環境也是非常重要。然而「校園性騷擾」這議題往往被忽略或隱瞞，也甚少學校會制定相關的政策保障師生和員工。莊耀洸設計了一張檢視清單，詳細審核香港八所政府資助院校的性騷擾政策，特別是政策的制定、政策內容、投訴程序及政策執行等四方面。他除了指出各大專院校仍需要改善其性騷擾政策外，也清楚顯示要有效推動和執行政策，領導者必須有決心，並要投放充足的資源。

最後，蔡寶瓊為我們回顧香港性別平等教育推行狀況、它的政治社會脈絡和發展前景。其文章清楚指出香港性別平等的改進，實有賴婦運團體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努力，特別是成功促使政府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和婦女事務委員會這兩個成果。前者的成立，除了推動社會討論性別平等的議題外，也修正了教科書、學制、派位機制中的性別定型和不平等。然而蔡寶瓊亦對推行香港性別平等教育的前景未敢樂觀。一方面是過去十多年政府以威權式的方法，推行市場導向的教育改革和愛國主義教育，嚴重削弱了人權和公義的推廣。另一方面，近年香港的宗教右派的急促冒升，亦似乎不利於學校對非主流的性別氣質的接納。再者，香港所有的師訓機構，仍然未有系統地培訓教育工

作者，使之具備性別平等意識。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前景，雖不至於黯淡，但仍然是長路漫漫。

性別研究從一開始就關注平等，因此在歷史上，性別與教育的研究始於兩性是否平等地參與教育過程。不過，時至今天，性別平等教育已遠遠超越了這個議題而變得更豐富、更多面向。鑑於性別與教育研究在香港仍然處於一個起步的階段，本書一開始加入了一篇「導讀」，精簡而詳盡地介紹有關性別平等教育論述的發展，以及本土在這方面的研究。讀者如果有興趣了解海外及本地在這個範疇中的思考路向的話，不妨先閱讀「導讀」。當然，也可以直接閱讀其他不同研究課題的文章。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雖說是長路漫漫，我們能踏出第一步，一方面很高興，但另一方面也戰戰兢兢。希望後來者眾，使我們旅途中不至於太寂寞！

我們能踏出這第一步，要感激下列曾出手相助的幾位人士：早期為我們安排寫作研討會、使作者能聚首一堂的林藹陽；為文章作艱巨的早期校對和增潤工作的謝偉強，幫助我們完成編輯工作和在資料搜集方面作最後衝刺的許佩琳，以及在出版前夕為我們統籌校對並作最後校對工作的潘宇軒、陳文彥和賴凱詠。最後，也要多謝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系和香港教育學院性別關注小組資助部分編輯工作的費用。

陳潔華、蔡寶瓊

作者簡介

陳潔華，畢業於香港大學及英國埃塞克斯大學社會學系。2005年加入香港教育學院，致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現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性別關注小組召集人，並教授「性別與社會」、「愛情·親密·家庭——想像與不平」及「剖析香港性暴力」等科目。研究興趣涉及性別和家庭研究，範圍有：學生的性別身份、校長的生命故事、教師行業的性別現象、香港家庭關係的變遷、育兒雜誌的親職論述和跨境學童的家庭生活等等。著作包括：《香港性別論述——從屬、不公、差異、越界》（編輯及作者，與王惠玲合編），《批判思考、創意教育——香港社區教育》（編輯），以及多篇學術論文。

鄭佩群，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主修心理學）及哲學碩士（性別研究課程／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範疇為香港中學校園的性教育。

蔡寶瓊，畢業於香港大學及英國牛津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學系多年，教授「性別與教育」、「性態教育」、「香港教育政策」等科目。任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主任，多年來致力推動性別研究。研究範圍包括：香港婦女運動、工人口述史、婦女口述史，教育政策、男性性別氣質建構等。著作包括：《姨媽姑爹論盡教改》（編輯及作者，與黃家鳴合編）、《千針萬線——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編輯及作者，與王曉鑫合編），以及學術論文多篇。

莊耀洸律師，社會科學學士（中大），法律（人權）碩士（港大），調解員，新婦女協進會婦女事務關注組前召集人及香港人權監察副主席。現職香港教育學院專任導師，教授「社會公義與歧視」、「人權初探」及「教育法律」等科目，是校內性別關注小組成員。莊耀洸執業律師期間，負責多宗歧視官司。近年曾到數十間學校為教師及社工辦工作坊，講解社工和教師需特別注意的法律和人權知識，如性騷擾、種族及殘疾歧視等。

金曄路，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曾於香港媒體工作，及於香港及中國大陸教學，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課程助理教授，教授性／別、媒體及文化研究等科目。研究興趣為華人社會的性／別及酷兒研究，目前正進行中國大陸的同志社群研究，即將出版專書 *Shanghai Lalas: Female Tongzhi Communities an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2012)。非學術出版包括《也是香港人：七字頭的新移民誌》（作者之一）、《月亮的騷動——她她的初戀故事：我們的自述》（編輯及插圖）。

黎楊惠玲，現任香港教育學院健康與體育學系助理教授，為資深教育工作者，早年曾任教中學，及後任職教育署（現稱教育局）輔導視學署。黎博士投身教師培訓工作多年，曾參與開發及任教的課程包括職前及在職中學教師課程，幼教課程，學士以及研究生課程。她的專業領域涵蓋科技與生活、健康和營養、性別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等，一直以強化學生改善個人生活質素的能力，以及促進個人、家庭及社會的福祉為教學目標。黎博士亦從事有關營養教育以及性別教育的學術研究，還積極參與有關促進健康的社區服務，包括為學校、家長及社會服務機構等提供講座及諮詢服務。

林藹陽，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於香港大學主修社會學，獲學士及碩士學位。其後於香港教育學院參與研究工作和教學發展，範疇包括性別與教育和教育政策與行政。其間積極推廣性別平等教育，曾參與相關的本地及海外會議、研討會和交流，並負責籌備工作。另曾於香港大學和香港公開大學兼任教學工作，任教社會學入門和香港社會等課程。林小姐主要從事有關教育社會學、社會階層化與不平等、性別與教育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為探討香港弱勢社群的教育參與、學校選擇與育兒經驗。

羅浩源，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助理教授、教育學士〔數學及數學教育雙主修課程〕課程主任。研究範圍包括行動研究、數學傳意與詮釋、數學學習與教學、教師教育。著作包括《生活的數學》、《數學教學對話：反思課堂從哪兒觀察》（合著）。

李鳳琮，畢業於香港大學及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現為香港教育學院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副教授及副系主任。其主要任教學科包括英語語法與教學，研究領域包括語言與性別、英語教學、英語沈浸及課堂研究等。

呂惠珊，香港中文大學語文教育學士、性別研究課程／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哲學碩士，教育局註冊英語教師。現職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導師，主力於全新核心課程導修課，科目包括「當代社會分化」、「現代中國的愛情、婚姻與性」及「重新認識殘疾人士」。興趣從吸收語文知識和鑽研教學技巧轉向探討英語學習和成就的社會文化因素，現同時體驗和思考通識教育科中的英文教育與英文科中的通識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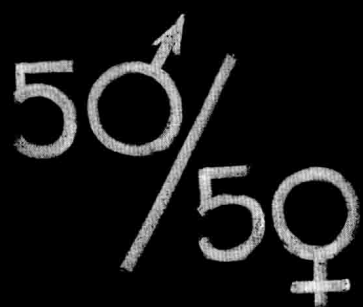
陸方鈺儀，澳洲坎培拉大學教育博士，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副教授及輔導科統籌，從事師資培訓三十餘年，曾任中學教師，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學顧問，教育學院講師、高級講師及首席講師。主要研究範圍：輔導課程、個人身份認同、老師性別身份認同和家庭變遷。任教科目包括輔導、通識科的自我及個人成長、家庭教育及家庭支援等。著有多篇刊於國際學術期刊的學術文章及《學校輔導：趨勢與實務》（編輯及作者，與李文玉清合編）。兼為香港教育學院性別關注小組創會會員及亞洲家庭聯盟的創會會員及委員。獲牛津校本家庭諮商會議頒發2011年校本家庭諮商傑出貢獻獎。

龍精亮，英國杜林大學教育博士，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他曾任中學輔導主任，有豐富統籌輔導、道德及公民教育之經驗。他任教的科目包括學校輔導、通識科的自我及個人成長、親密人際關係的戀愛與婚姻及生活技能等。他亦致力於個人及社會教育、青少年戀愛關係、教師個人成長、班主任的輔導角色和學校輔導行政方面的研究及發展。

鄧芝珊，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曾任台灣世新大學性別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專長主要為性別研究、酷兒研究、都市空間、媒體與文化等，曾任職於美國及加拿大社會福利機構，服務社群包括遭受性暴力的女性、同志、邊緣青少年、原住民、精神病康復者、性工作者，以及愛滋病患者／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亦曾擔任「香港同志影展」總監。

王秉豪，現任香港教育學院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副教授，兼任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總監。大學畢業後曾任中學教師十年，後投身教師教育。香港大學教育碩士，專修宗教教育與品德教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專研心靈教育。

姚偉梅，現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及院校協作與學校體驗事務處聯席總監。姚博士一直致力於發展和教授商業學學科，範圍包括職前和在職教師，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她的主要教學領域是商業學和商業教育學的教學法和當代議題。她的教學以學生為中心，理論聯繫實際，以激發學生主動學習和知識轉換的能力。姚博士的研究和出版領域主要着重於人的能力，教學策略，商業教育，企業教育，個人財務教育以及性別教育。姚偉梅博士曾於2003至2004年度獲得香港教育學院頒發優秀教師優異獎狀，並於2009至2010年度獲得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頒發教學學術優異獎狀。



導讀

性別平等教育論述的發展 與香港本土研究回顧

蔡寶瓊、陳潔華

早期的性別教育平等理念較為簡單，所指的是男女生的入學率、流失率和學業成就水平是否相若(Ringrose, 2007)。在國家提供全民普及免費教育之前，女童入學率通常較男童低，反映出大多數社會在父權文化、同時又沒有國家法規或資源補助下，父母都是選擇把僅有的資源投放在男孩身上。因此，男女童入學率、流失率和學業成就的相對數字就自然成為性別平等教育狀況、以至國家「進步」的指標。舉例說，2010年聯合國發佈的《全球教育彙編》(Global Education Digest 2010)，就以「分析各國為每位兒童及年輕人——不論其性別——提供均等教育的進展及障礙之最新資料」為主題，為的是響應1995年國際群體在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中所訂下2015年消除各級教育的性別差距這目標(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2010)。事實上，在貧窮的國家或在國家的貧困地區，例如中國內地農村，女童的低入學率和高流失率（見「香港滋根基金會」網頁），在國際人權和平等的大論述下，是一個恆常需要解決的難題(Blackmore, 2000)。

對香港和其他高國民生產總值的社會來說，達致某一教育水平的免費普及教育已經實施多年，故此男女就學率早已沒有明顯差距。在這情況下，性別平等教育所關注的，一方面是教材、教科書是否有刻板化的性別呈現，致使兩性（尤其是女性）學生在成長中受到既定的性別形象所局限（平等機會委員會，1999）；另一方面則是較細緻的數字分析——其中較常提及的是女生在各級理工科的較低參與度，甚至兩性之間出現「文理分隔」狀況(Kershaw, Alicia and DeGolyer, 2006)。這些討論隨着不同社會的教育發展步伐，在1980、1990年代相繼出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方面的討論漸漸從純粹數字上的比較，深化到較細緻的討論，包括學校生活中的性別身份建構、師生和學生之間建立的性別層序和性別與知識建構等等。

學校生活中的性別身份建構

在「文理分隔」方面討論最多的，要算是數學教育中的男女差異。關於這課題，本書有專文探討（見第3章），這裏不贅。簡言之，論者留意到在數學課堂中，師生互動往往受到老師自覺或不自覺的性別觀念影響。教師對男女生抱有不同的態度，學生也就因應老師的期望（對男生較高、女生較低）而調校自己的參與度，因而影響在數學和其他理科科目的興趣和成就（黃幸美，1995；Povey, 1998）。除了教師期望以外，不少學者也留意到學生之間的互動其實也

有明顯的性別差異，而這差異也影響着學生在數理科的投入。這個觀察讓我們看到，學生本來就帶着社會的性別烙印走進學校；不單如此，他們還時刻主動地在社群生活中體現和建立自己的性別身份和氣質，而這個過程與不同學科的學習——參與或投入的程度、學習的模式、學習的要求和滿足感等——都息息相關(Letts, 2001; Staberg, 1994; Forgasz and Leder, 1996; Chapman, 2001)。

學生在學校生活中建立性別身份和氣質這個觀察，大大提升了我們對性別平等教育的理解。從關注男女童就學率、教師期望、課本的性別刻板化等，到探討學生的男性或女性氣質建構(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ies and/or femininities)——這裏牽涉到一個重要的論述轉變。簡言之，在新的論述中，學生由一個被動的、受塑造（或受「社化」socialize）的客體，變成一個積極建立自己身份——尤其是性別身份——的主體；這個主體的建立過程流動多變，因而各人的性別氣質也有多元表現的可能(Taylor, 2004; Skelton, 2001; Keddie, 2006)。有了這個論述的改變，性別平等教育的分析也就不能停留在靜態的政策規劃（入學率、課程或教材檢討等）層面，而要時刻留意學校生活，尤其是師生之間及同學之間互動過程的性別意涵。要做到這點，教育研究者和教師，也就非要具備敏銳的性別觸覺不可(Houston, 1994)。同時，也需要對社會既定的性別框架持有批判的角度，否則就不能給予個體（包括學生和教師）一個寬闊自由的空間，容讓他們建立獨特的性別身份(Keddie, 2006, 2010; Martino *et al.*, 2004)。

師生與學生之間建立的性別層序

所謂「性別觸覺」，就是覺察到性別關係原來是處於特定社會結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非隨機出現，而是在一些持久的、有系統的模式下進行(Connell, 2002、劉泗翰譯，2004，頁90)。舉一個例子，本書編者之一陳潔華曾在她的一項研究中發現，性別層序(gendered hierarchy)是學校其中一個重要的人際關係模式。這個性別層序支持着一套男性中心價值觀和假設，因此在研究個案中，銳意引進改革的校長喜歡聘請年輕、單身女教師，因為她們的青春活力能為學校提供密集的勞動力。她們被認為是沒有「家庭負累」，因此也可以為學校做超時工作。不過，一旦女教師結婚，尤其是生孩子後，學校就對她們不再信任，她們也就升遷無望。相反，婚姻和生兒育女對男性教師的升遷卻毫無影響。陳潔華進一步指出：這個模式高舉某一種男子氣質——擔負起

「養妻活兒」的角色、但不參與照顧孩子或做家務。在這種氣質要求下，已婚而有兒女的男教師就能夠高踞管理領導層的位置。不過，並非所有男性教師都認同這種男子氣質；相反，有個別男教師覺得受到這種男子氣質所局限，與家庭相處時間不足，因而感到遺憾(Chan, K. W. A., 2004a)。

性別並非是塑造社會結構和關係的唯一因素，它往往結合階級、種族等其他層序性質的因素而產生影響。在另一項研究中，陳潔華比較就讀於教會「名校」與第四、五組別「屋邨學校」的女生，發現後者無論在學業或個人自由方面都較前者受到更大的限制。就算是名校的女生，來自勞工階層的少數也感覺到更大的壓抑，與出身中上階層的女生那種自由自在的感覺有天壤之別(Chan, K. W. A., 2004b)。此外，潘宇軒和蘇欽華分別在低與高階級位置和成績組別的學生群體中作深入研究，也發現階級因素在男性及女性氣質建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潘宇軒 2008；蘇欽華 2011)。

建立多元性別身份的空間

教育工作者如果具有性別觸覺的話，對學校生活中的社會結構及其種種限制和不公，就能較容易覺察和作出批判，從而讓個別學生或其他學校成員享有更大的空間和自由。2000年4月，台灣屏東一位具陰柔氣質的國中(初中)男生葉永鋕在學校的意外身亡，引起婦女、人權、教育及同志平權等團體對學校欺凌——尤其是針對不符合主流男性陽剛氣概的男孩的欺凌和暴力——的關注。結果，當時正在討論的《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其後於2004年以《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名通過(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成員，2006)。法例的易名，顯示出性別平等教育論述的一大轉變——從兩性的平等待遇，到性別氣質、定位和身份等多元和流動的可能和限制。用蕭昭君的話說，「葉永鋕的苦難打開了許多教育工作者的性別視野，從此，多元性別特質以及性別暴力，成為教育工作者必須正眼凝視的現實」(蕭昭君，2006，頁12)。

其實，男生之間由厭惡女性化氣質(misogyny)和恐同(homophobia)出發的欺凌以至暴力，在不同社會中都十分普遍，甚至教師自己也會間接鼓勵或甚至參與其中。英國研究者Mac an Ghaill在一所公立中學為期三年的參與式研究，詳述男子氣概的塑造，是如何建築在排斥和貶抑女性和恐同的行為和態度之上(Mac an Ghaill, 1994)。他的發現，其後也得到其他英國研究者的支持(Epstein,